

新世纪以来中美城市设计学科发展与社会进程关系比较

——基于学术研究现象和历史事件的分析

王伟强 张 颖

提 要 运用文献计量、历史分期和事件分析等方法,建构比较研究框架,通过城市设计研究现象表征学科发展,并置于多维度的社会历史过程中加以考察,探究新世纪以来中美城市设计学科发展的特征、阶段及其与社会进程的关系,进而对我国的的城市设计学科发展提出思考和建议。研究揭示了两国在学科构成、内容重点和学术逻辑等方面的差异,并将成因归纳为外部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内部的学术文化和体制、内外之间学科与社会的关联等方面。未来我国城市设计学科发展在坚持经验的基础上还需面向新时代探索转型,需要深化主体意识、提升社会功能、创新学科体制、转变行动策略,以知识为核心开展创造、传播和协同,发挥城市设计更广泛的社会作用。

关键词 城市设计;中美比较;社会进程;学科发展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361/j.upf.202104004
文章编号 1000-3363(2021)04-0018-08

A Sino-US Comparis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volvement of Urban Design Discipline and Social Processes in the New Century—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Historical Event Analysis

WANG Weiqiang, ZHANG Ying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a comparative framework and examines the evolvement of urban design discipline in China and U.S. It situates urban design researches within the wider context of social processes and maps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phas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 design discipline and social processes in the two countries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e new century.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method combining bibliometric,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and event analysis is used. The paper also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urban design discipline in China. The result reveals the Sino-US differences in disciplinary composition, focus, and academic inquiry logic. The paper then summarizes the causes from the aspects of external social structure, internal academic regim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cademia and the society. China's urban design discipline needs to be transformed according to the vision of the new era toward greater self-identified, elevated social functions, innovative academic regime, and transformative action strategies in order to take on wider social roles.

Keywords: urban design; Sino-US comparison; social process; discipline evolvement

现代城市设计在我国经过近40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交叉学科的基本形态。美国作为城市设计学科的先发国家,通过与其比较研究有利于发现经验和总结规律。

我国既有关于城市设计学科发展的文章以学术观点论述居多。王建国(1991)将城市设计作为正在完善和发展的关于城市建设的综合性学科。金广君呼吁设置独立的城市设计学科(金广君,等,2004)。吴志强在论述规划学科发展中强调城市设计始终是规划学科的支柱之一(吴志强,等,2005)。徐苏宁(2012)认为建筑和规划学科都应该设立城市设计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从城市设计研究角度出发分析学科发展也有成果,如余柏椿(2008)、李少云(2004)等的研究。但总体而言,探究学科发展与社会进程间关系规律的实证研究较少。在国外,城市设计应作为一个领域还是学科也一直有不同看法,在英语国家中,城市设计学科建制更加成熟,但由于其文化自治度高,较少从总体层面探究学科发展问题。

学科是学术的分类。学术研究现象作为学科发展的核心内容,可以体现学科的发展特征。本文以期刊文献为对象,结合历史事件,将学科发展置于专业实践、经济社会环境等综合社会进程中加以考察,认为学术发展和宏观社会之间在“互构”的过程中实现结构性演进。研究建构比较框架,采用文献计量、历史分期和事件分析等方法,探究两国城市设计研究及学科发展的特征、阶段及其与社会进程的关系。

作者简介

王伟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wwq@tongji.edu.cn
张 颖,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其中,文献分析内容以2000年至2019年中国和美国的主要期刊城市设计主题文献为对象(局部分析回溯至1980年),中国样本以中国知网期刊库为数据源,检索主题含“城市设计”的文献,按发文量降序且属于核心期刊的原则,得出我国城市设计研究发文的8种主要期刊:《城市规划学刊》《城市规划》《规划师》《国际城市规划》《建筑学报》《新建筑》《南方建筑》《华中建筑》,检索得到1312条题录,经数据清洗后样本数为1207条。美国样本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SCI、SSCI、A&HCI分库为数据源,检索主题为urban design或city design,得出的8种主要期刊为: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and Planning Research,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Record, Architectural Design,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Journal of Green Building,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检索得到197条题录,清洗后样本数为182条。检索时间为2020年1月28日至2月4日。

1 中美城市设计学科构成的异同及成因分析

本文用样本期刊所属学科来表征学科构成,因为这些期刊是按相关文章发文量降序得出的,是该国发表城市设计主题文章最多的核心期刊,期刊所属学科可以反映出该国参与城市设计研究的主要学科。

1.1 学科构成比较

比较显示(图1),两国共通之处是规划和建筑学科都居于主体地位,但是美国已经形成包括环境、交通、工程等多学科共同参与的格局。

1.2 学科构成演化的成因分析

现代城市设计理念在1980年代引入我国,一方面源于建筑学科内涵拓展,另一方面源于规划学科适应市场化改革的借鉴和开拓。1990年代在规划行业形成了城市设计发展的小高峰,上海陆家嘴、北京商务区、海口中心区等城市设计国际征集影响广泛,1991年《城市规

划编制办法》规定规划各阶段都应运用城市设计方法。新世纪初城市设计大繁荣以后,两学科参与的动力有所转变。建筑学科关注度呈大起大落,且其转折点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点有重合,表明其受经济建设形势影响较大;规划学科的起落点则与国家政策法规的转换点有重合,表明其受政策环境影响更大。

美国建筑学科在1950年代创立城市设计学科,基于规划学科远离空间形态和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直至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上半期,建筑学仍是城市设计研究的主要发文阵地(图1)。

第一次转折出现在1995年,规划学科关注上升(图1)。根据美国教育项目目录CIP2000,城市设计由原来在建筑学之下的二级学科调整到规划学科下的三级学科。该目录是对大学调查的统计,反应了高校中的实际变化。究其成因,建筑学科在2000年后增加了“建筑历史与批评”“建筑科学与技术”“房地产开发”等二级学科,规划学科特色分化,部分强建筑背景的规划系以城市设计教育项目搭建跨学科平台,这反映了美国大建筑学科内部格局的新发展(张颖,等,2020)。规划学科对物质环境重新关注,被认为与规划实践受到批评有关,如区划的不良效果等;也与社区对设计品质的关注有关(Anselin L,等,

2011);还与全球化相关,反应了“创业城市”和“城市竞争力战略”的要求(Punter J, 2007);同时,随着城市设计学科内涵不断拓展,更加综合性和社会化(童明,2017),与规划学科亦日益交叠;欧洲城市主义学派的重新兴起也有一定影响(侯丽,2012)。

第二次转折发生在2006年,环境、工程、交通等其它学科加入(图1)。这源于可持续、健康等社会思潮和学术趋势,也和美国交通、卫生等公共政策纳入空间环境要素有关。环保运动发展,卡特里娜飓风以及戈尔领导的应对气候变化运动等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共识形成。1998年《21世纪交通公平法》(TEA-21)规定,自行车设施和人行道应结合所有联邦资助的交通项目(Southworth M, 2005);2010年制定的《健康公民2020》将“创造促进健康的社会和物理环境”作为四大核心目标之一(CDC, 2020)。从国际上看,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在2008年创办了Urban Design and Planning杂志,也体现了这种学科参与趋势。

2 中美城市设计学科研究重点、学术逻辑的异同及结构性成因

比较两国2000年以来研究重点和内在学术逻辑的异同,并置于专业实践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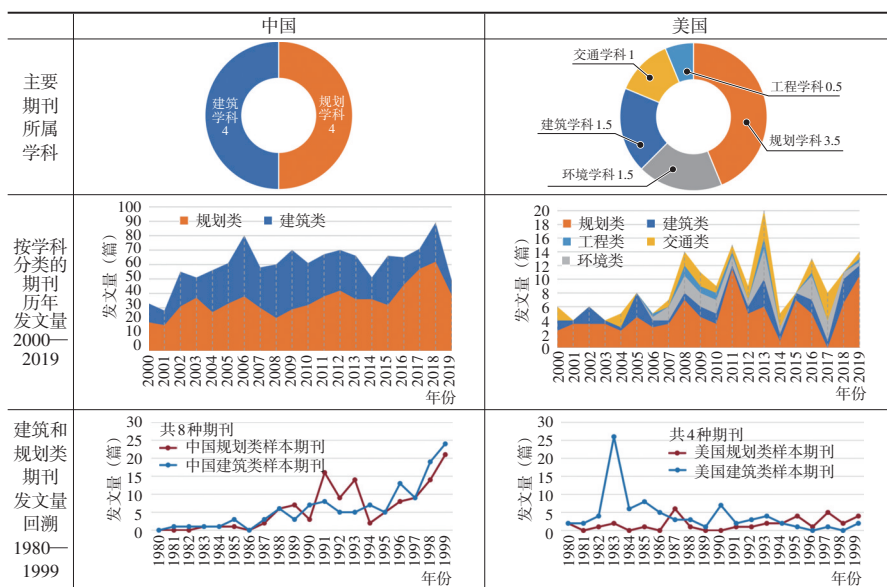


图1 中美城市设计研究主要期刊所属学科和按学科分类的发文量比较

Fig.1 Comparison of discipline affiliation of main journals featuring urban design researches and quantity of publications from China and U.S.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

宏观社会背景中分析其结构性成因。

2.1 研究内容重点比较

综合关键词词频和聚类分析的结果^① (图2), 两国研究内容的共性缘于城市设计的内涵, 即与城市形态、建成环境、城市规划相关, 但差异也十分明显。

从理论/实践维度看, 我国以实践性议题为核心, 包括总体城市设计、城市设计导则、控制性详细规划等编制管理实践, 以及广场、城市更新、城市特色等应用领域。而美国更加侧重人性化的理论性议题, 如体力活动、邻里、建成环境、步行、出行、健康、影响因素等。此外, 在美国“设计”也是重要主题, 体现了对设计学科属性的坚守。

从对象形式/主体内容的维度看, 我国依实践的形式和环境对象的形式而分类。美国则关注内容的专题方面, 如健康促进、社会资本、气候变化, 环境可持续、安全等。两者存在对象的 (of) 和主体的 (in) 的差别。

从空间/社会的维度看, 我国的聚类多按照空间对象和控制类型相区别, 美国则体现出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社区、城市、全球各层级的社会议题。

2.2 学术逻辑的异同

高被引文献的类型反映了一个学科将哪些种类的知识作为基础, 本文各提取20篇高被引文献^②, 并建立了两个维度的知识分类框架, 比较其类型分布 (图3), 以考察学术逻辑的异同。关于知识类型划分, 参考亚里士多德的三种分类——理论知识, 实践知识和创制知识 (苗力田, 2016), 以及国际经合组织 know-what, know-why, know-how 和 know-who 的四种分类 (OECD, 1996), 形成两个维度12个区间。

两国学术逻辑的共性是基于城市设计作为应用学科, 实践类知识是重要知识基础。而两国的差异也很明显。

我国的知识基础建立在两大基点之上: ①关于本体认识的知识, 主要是对城市设计本体的认识和规划体系中城市设计发展的认识, 也有关于城市肌理、城市综合体等城市本体的认识; ②关于方法技术的知识, 其中有方法层面的成果, 如城市要素整合的城市设计机制,

寒地城市设计对策, 以“日常生活空间”为核心和“触媒效应”方法等; 也有面向特定类型城市空间的设计编制方法, 如公共空间、大学校园、滨水地区、街巷空间等的城市设计; 以及落实国家政策的实践, 如“城市双修”“特色小镇”等。美国在该方面也有不少核心成果, 但比例明显低于我国。

美国的知识基础也有两大基点: ①因果关联机制方面的知识, 其中有系统化的解释, 如建成环境与社会资本, 开放空间与步行, 街道环境与体力活动和步行, 感知与环境特征的关系等; 也有特定关系证据的知识, 如物质环境的某些方面与出行、体力活动、安全、能源使用、邻里满意度、儿童健康等的关系; 还有对既有理论加以验证。相比之下, 我国因果关联机制方面的核心知识存在

断层; ②与规范性社会价值相关的知识, 重视将价值取向、参与主体、社会关系方面的知识作为基础, 如关于社会资本、儿童、老人、步行者、骑行者等的研究。而我国在此方面关注度相对较低。

2.3 结构性成因分析

上述差异背后的内、外部结构性成因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是中美两国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美国城市化阶段已经到了后期, 但仍存在人口向大都市区的进一步集聚。其城镇化率在1960年就已接近70%, 2000至2019年, 由79.1%缓增至82.5%, 百万人以上都市区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43.8%升至46.5%, 超过1970年至2000年30年间的增幅 (World Bank, 2021)。我国则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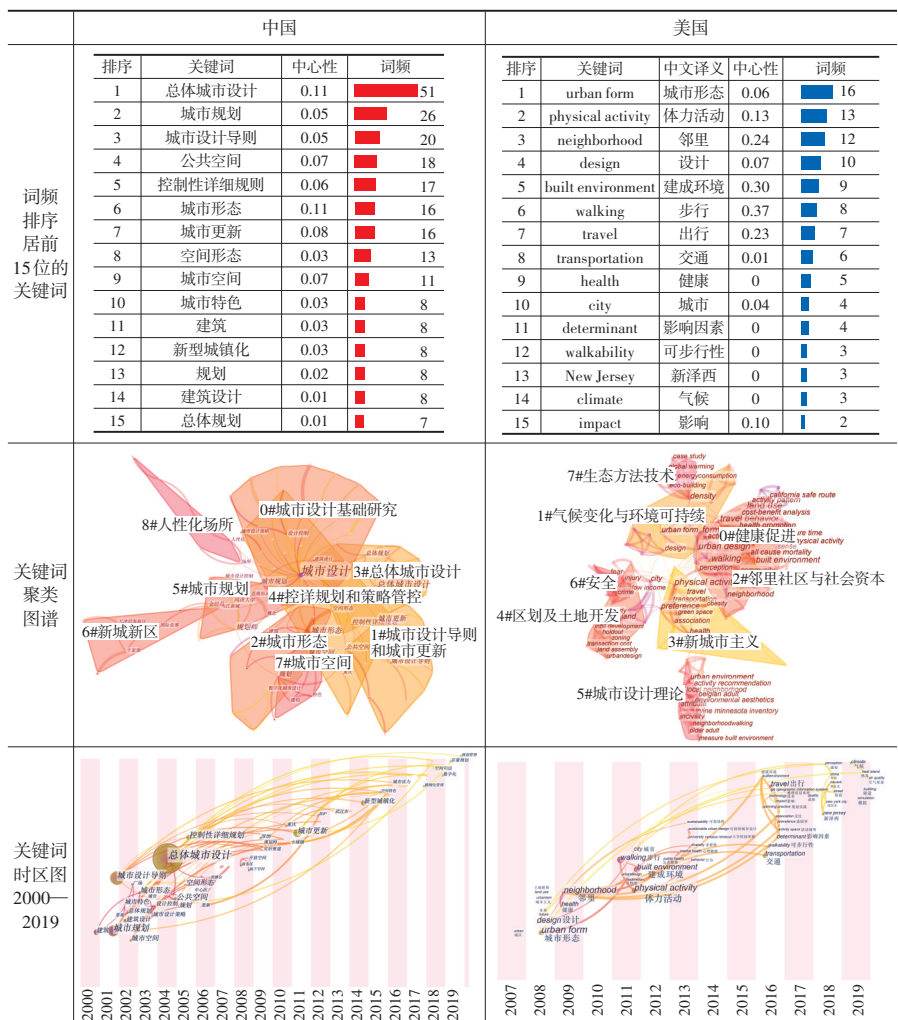


图2 中美主要期刊城市设计研究内容重点比较

Fig.2 Comparison of key issues of urban design research from major journals of China and U.S.

资料来源: 作者制作。

2000至2019年,城镇化率由35.9%增至60.3%,大都市区人口比重由17.1%升至28.5%(World Bank, 2021)。而且随着全球化带来外资涌入,我国城市土地快速开发,带来大量设计编制需求。我国城市设计研究以编制实践为核心,注重空间控制,按实践和对象积累经验等特征都是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密切关联的。而美国城市化处于质的提升阶段,关注健康、可持续、人的发展、社会价值等议题符合其社会发展阶段需求。

第二是政治体制的差别,包括国家制度和城市治理体制。我国有强有力的国家机构,在分税制条件下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存在路径依赖,在全球化背景下追求城市竞争力和营销效果,使得城市设计主要是为上述行动服务,但难以做到对社会价值和问题充分关注;在“增长联盟”和任期制、政绩竞赛的制度框架下,实施难以充分,理论和实践之间难以循环演进,导致因果关联机制的研究缺乏。美国的情况又在另一端,由于其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传统,城市设计编制的市场需求小,与编制实践有关的研究缺少需求,而且规划权力下沉到地方,在民选自治和关注种族、性别平等的背景下,城市设计研究追求与社区、邻里以及各个社会群体建立关联,重视社会价值和以人为本也是其获得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此外,美国的公共政策还走向循证,2016年美国国会成立了循证决策委员会(CEP, 2021),并于2019年通过《循证政策制定基础法案》(Congress, 2019),因果关系证据的研究对于学科合法性有基础性作用。

第三可以溯至学术文化。两国的学术共同体在意义追求上存在实用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差异。我国自清末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快速赶超的大背景下学界更侧重回答“是什么?”“怎么做?”的问题。美国的学术文化可以用进步主义加以概括,进步主义追求理性、正义、社会进步等,对应美国学术文化中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定位,大学对学术卓越的追求、对全球领导地位的认知、对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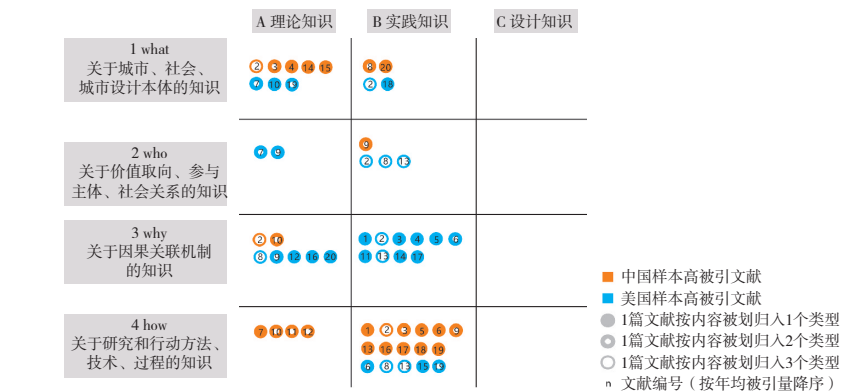


图3 中美主要期刊城市设计高被引文献在知识分类体系中的分布(2000—2019)

Fig.3 Knowledge type distribution of highly cited papers on urban design from main journals of China and U.S. (2000—2019)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

会服务、产业转化的重视等。美国更侧重回答“为什么这样?”“为谁规划?”“面向哪些社会议题?”“如何领导未来?”当然,学术社区普遍存在的与社会实践远离的趋势在两国都有体现,我国对“学术GDP”的追求使得价值导向、社会参与、设计等社会性议题缺乏吸引力,美国则耽于理论开拓,而对实践关注较少。

第四具体到学科发展特征及其与实践和社会的互动过程。首先,从学科发展阶段看,美国处于更为成熟的阶段,以理论性专题为核心,注重主体研究,拓展社会价值,回应社会问题;其二,从学科构成看,美国力求建立沟通建筑、规划和景观等学科的桥梁,以开放的学术文化和灵活的学术体制形成多学科共同参与的格局;我国尽管对城市设计跨学科特征有共识,但在实际学术体制中却并未真正实现,甚至反而有进一步区隔化和单一化的趋势;其三,从学科与社会的互动看,我国学术界有潜在的精英主义倾向,希望通过理论和技术进步提升专业的合法性,同时受政策和市场等外力驱动明显;美国则持社会协同的主动姿态,在公众传播与互动中争取广泛支持。如旨在改革规划体制的探索“迈阿密21——形态准则”历时4年,召开公众参与的会议多达500余场(Sanoff H, 2000)。笔者通过统计亚马逊和当当网评论数对比了两国城市设计类畅销著作,发现我国居前的是面向专业者的国外经典译著和最新专业实践,美国则直接面向大众传播,如《郊区国家》《精明增长手册》《步行城市:市中心如何拯救

美国,一步步前进》《气候希望:城市、企业和市民如何拯救地球》等。最后,从学科对社会的作用看,我国侧重技术工具作用;美国则赋予城市设计广泛的社会发展功能。

3 新世纪以来中美城市设计学科发展历程和与社会的关联机制分析

本部分通过描述城市设计研究的动态变化,并结合学科、行业、宏观社会的相关历史事件,分析自新世纪以来两国城市设计学科演进的阶段特征和各因素的关联机制。

3.1 学科发展阶段划分和主要特征

两国自新世纪以来的学科发展历程均可概括为三个阶段(图1,图2)。

中国:①2000—2006年理论和实践双繁荣阶段。大量研究议题涌现,聚类形成;②2007—2014年稳定务实阶段。研究热度下降,主要回应当期实践主题;③2015年以来新热点形成阶段。出现方法技术类主题和政策管理类主题。

美国:①2000—2007年延续探索阶段。新热点主题较少,但不少聚类在此阶段开始生成,显示研究的多方向探索;②2008—2015年专题拓展阶段。大量核心热点主题出现,如体力活动、建成环境、邻里、步行、健康、可持续等;③2016年以来全面探索阶段。又有大量新主题涌现,其中不少是对前期主题的细化和概念化;还有实践经验,气候和环境,技术相关主题等。

中国		美国	
政策、经济、社会背景	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	政策、经济、社会背景
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中国启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十九大召开。阐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 住建部出台《城市设计管理办法》 国办“推动1亿人落户城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城市设计工作要求 楼市调控升级，全面实行限价审批 国家启动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加强城市设计，提倡城市修补” 中国启动扶贫攻坚战 GDP增速低于7%进入“新常态”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推进新型城镇化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 十八大召开，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数量减少，人口红利下降 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 国务院发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医疗保障网基本实现全覆盖 “国十条”调控房价 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 上海世博会 中国开始加快高铁建设 中国实施四万亿计划应对金融危机 北京奥运会 汶川大地震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未体现城市设计内容。制度化控制土地使用和开发 新版《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淡化城市设计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2003—2006年，各类开发区从6866个降至1568个，面积从3.68万km ² 降至9949km ² 。城市开发重点由开发区转向综合新区 8.31大限：国土部等下发通知，所有经营性土地一律招拍挂出让 2003年底中国房价开始快速上涨 科学发展观提出。其后提出构建和谐社区，社会建设纳入总体布局 国办《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 2000—2002年间新批准了17个国家级经开区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 入世前国企改革深化，抓大放小，实行股份制现代产权制度，出清债务	多家机构先后举办未来城市设计相关竞赛 天津规划论坛暨城市设计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城市设计论坛暨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设计分会成立 首届郑州国际城市设计大会 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设计全球征集 北京政府开始举办公共空间城市设计大赛 住建部启动全国2批57个城市的 城市设计管理试点工作 2017 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设计方案征集 上海制定《街道设计导则》 上海政府开始每年举办城市设计挑战赛 清华大学创办《城市设计》学术期刊 2015 天津滨海新区中加低碳生态示范区城市设计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2014 深圳国际低碳城规划设计 2013 南京市青奥村地区总体规划及城市设计 2009—2012年间，14家省级地方规划立法中有涉及城市设计的条文 2012 城乡规划学升为一级学科，建筑学设 城市设计及其理论二级学科 2011 天津市探索实行城市设计导则管理 苏州总体城市设计 2010 上海外滩滨水区城市设计竞赛 2009 深圳探索城市设计成果纳入出让条件和规划用地管理环节 北川县新县城城市设计 2007 2006 规划专指委开始每年举行本科城市设计学生 作业交流评优 成都宽窄巷子保护规划与设计 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城市设计 上海北外滩城市设计国际咨询 重庆都市区总体城市设计 广州大学城城市设计竞赛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立城市设计学术分委会 北京中轴线城市设计国际咨询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概念设计国际竞赛 重庆江北地区滨江地区城市设计 上海2010年世博会场地规划设计国际竞赛 郑东新区总体发展概念规划国际竞赛 温州中心城区整体城市设计 国际建协第20次大会《北京宪章》倡导 2000 广义建筑学 广州城市总体发展概念规划	2019 新城市主义大会发布密歇根州 区划改革用户指南 2018 印第安纳州韦恩堡市公共领域行动 规划（小巷） 美国建筑师协会(AIA)成立设计健康倡议 组织，开发了6种循证设计方法 劳德代尔堡市咸城市主义规划 在康威流域框架规划中，阿肯色州社区 设计中心领导形成了多部康威湖改造 流域联盟 底特律规划部门与社会和非营利组织 合作开展东河地区框架规划 2015 纽约大U（The BIG.U）方案整合社会 基础设施和韧性城市 UCLA 老年公园设计导则 小石城创意走廊主街规划中，30多个组织 在六年内建立公私伙伴协作关系 波特兰齐德庭院绿色基础设施生态区规划 高线二期对外开放，公民领导项目产生广泛 影响 芝加哥中心区低碳规划 波士顿完整街道设计导则 商业改善区BID政策在全国普及，2010年全 美有近1000个BID，其中约36%是在2000年 以后建立的 SOM大湖世纪公益性倡议，来自35个组织的 科学家和各界人士促进大湖区百年愿景 2008 《新城市主义宪章》附加可持续建筑 和城市主义准则 2007 美国规划协会(APA)开始每年评选伟 大的场所 旧金山帕克默塞德规划，改造建设可持续社 区，召开会议500余次 西雅图绿色指标区划管理工具 2005 迈阿密21—基于形态的区划历时4年， 召开会议500多场，开发了1个网站 宾大领导费城特拉华河中部公民愿景和行动计划 2004 波士顿606铁路线公共空间行动开始， 邻居组成布鲁明代尔小径之友 2003 国家“911”纪念地设计竞赛 2002 芝加哥千禧公园规划 2001 美国首都华盛顿城市设计与安全规划 芝加哥河滨道开始建设 2000 新城市主义大会发布《新城市主义 宪章》 布鲁克林大桥公园地区规划	中美贸易战开始 全美累计有1477个社区通过了 完整街道政策 《循证政策制定法》法律通过 特朗普政府实行“全球收缩，美国 优先”政策，对内减税加息，对外 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 几十个联邦投资项目以支持精明增长 哈维飓风，损失1250亿美元 美国签署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白宫智慧城市行动倡议》 美国国会成立循证决策委员会 美国30个地铁都市区中可步行城区 的房地产市场份额首次超过郊区， 并显示出大幅提高的租金溢价 巴尔的摩种族问题40万人抗议和骚乱 失业率自2015年开始低于5% 美国环保局发布绿色基础设施战略 议程 奥巴马发布《总统气候行动计划》 桑迪飓风袭击美国东海岸，造成 750亿美元的损失 2011—2015年，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的可持续社区倡议计划累计拨款2.5 亿美元，支持了74项区域规划和69 项社区挑战规划，覆盖了40%的美国 人口，吸引了3300多个伙伴团体 美国对利比亚战争 民众“占领华尔街”事件 《健康公民2020》将“创造促进健康 的社会和物理环境”列入四大目标 民主党失去众议院，政治分裂开始加剧 奥巴马推行绿色经济，众议院通过 《清洁能源安全法案》 奥巴马推行《2009美国复苏与再 投资法案》总额为7870亿美元 7000亿美元金融救援计划 全球金融危机 奥巴马成立白宫城市事务办公室， 制定城市和大都市区蓝图，促进 跨部门合作 美国次贷危机 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艾尔·戈尔与联 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戈尔主演了气候变化纪录片《不 可忽视的真相》 卡特里娜飓风摧毁了海湾沿岸中北 部的部分地区，尤其是新奥尔良 “互联网和信息制造业开始”黄金 十年”大发展 布什签署《2003清洁空气法》 布什政府推行《美国梦首付付款法案》 美国对伊拉克战争 美国开始实行长期的低利率金融 政策，经济在互联网泡沫消退后 较快恢复 成立国土安全部，通过《国土安全法》 美国对阿富汗战争 911恐怖袭击 布什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 华盛顿5.1反全球化游行

图4 中美与城市设计研究发展相关历史大事件图（2000—2019年）

Fig.4 Map of big events in the urban design profession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U.S. (2000—2019)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

3.2 学科发展与社会进程的关联机制

前文成因分析包含了内、外部结构性因素，但具体发生的过程机制还需要在真实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图8）。

从我国发展历程看，2000年后城市设计研究高度繁荣，一方面与全球化、

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国家体制改革相关，概括地说是来自市场力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是学界和业界积极探索的成果。具体而言，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资本涌入，至国际金融危机的2008年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是2000

年的2.27倍；GDP增长率由2000年的8.5%至2007年的14.2%（国家统计局，2021）；年度城市建设用地增量由2000年的914km²增加到2007年的4586km²，达到历史峰值；仅2000—2002年间，新批准了17个国家级经开区。北京奥林匹

克公园、上海世博会、北京中轴线、广州概念规划和大学城、郑东新区等竞赛产生了广泛影响。学科建设方面,国际建协第20次大会《北京宣言》宣告建筑学科的拓展;中国规划学会《中国当代城市设计精品集》,建设部《城市规划资料集第五分册城市设计》等在业内传播,专指委开始每年举行规划系本科“城市设计”作业评优,城市设计成为规划师培养的主干内容。一批学术成果影响深远,如王建国,洪亮平,邹德慈等的著作。

2007年以来的热度回落主要受国家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方面的影响。宏观规划政策以法定控制、城乡统筹、区域协调为重点,2006年版《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淡化城市设计,《城乡规划法》未提及城市设计,而且国家逐年加大对房地产业的调控力度。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告别了超高速增长时代;我国城镇化率自2011年起超过50%,增速开始趋缓;同时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突出。物质形态型城市设计的需求开始下降。

2015年以来城市设计的新发展主要源于国家政策推动和学术开拓、学科建制的内力驱动。2015年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城市设计工作,2017年建设部出台《城市设计管理办法》并启动全国试点。自然资源部要求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强化城市设计方法。学界的积极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数字化技术方面,在国际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城市设计分会,清华大学创办《城市设计》学术期刊,城市设计专门教育也在探索开展中。

从美国进程看,尽管城镇化已进入后期,但2000年以来的形势仍为城市设计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大都市区出现了再中心化,城市景观和人居环境优化,知识密集产业集群兴起,全球城市竞争促进空间营造,纽约、芝加哥、西雅图、旧金山等城市的实践起到了标杆的作用。“911”事件后,美国试图通过军事权力维护其信心与地位,但其经济景气和意识形态影响力却并不足以支持,加之互联网泡沫的破裂,房地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点,布什政府在2004年开始推行《美国梦首付法案》,房地产业的发展也为城市设计提供了应用场景。

美国2008年后的活跃发展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合力。外力来自公共政策和公共投资的带动:金融危机后,美国加大公共投入,奥巴马政府对城市问题非常关注,在2009年设立“白宫城市事务办公室”。美国经济发展署(EDA)于2011年开始实施“强大的城市,强大的社区”计划。2011—2015年,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的可持续社区倡议计划累计拨款2.5亿美元,支持了74项区域规划和69项社区规划,覆盖了40%的美国人口,吸引了3300多个伙伴团体(HUD, 2020)。内力主要源于多学科参与和多元社会价值对城市设计领域的开拓。从CiteSpace引文分析看,排序前十的期刊文献中有五篇来自医卫健康类期刊,且为多为跨学科团队合作,显示出跨学科参与提供了新的知识基础。还有多元社会价值的确立为城市设计获得广泛社会支持奠定了基础,如区划改革、公共健康、应对气候变化等。

2016年以来全面探索阶段的重要动力是社会参与和认同。社区公众参与城市设计日益蓬勃,公民领导项目如纽约“高线公园”、芝加哥“布鲁明代尔小径”等成为城市更新的新兴模式,大学与专业机构、社会组织通过深度合作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如康威湖改造流域联盟、滨水联盟、韦恩堡小巷行动、密歇根区划改革等(APA, 2021; ASLA, 2021)。新城市主义理念经过多年的社会动员促进了人们空间使用偏好的改变,正如记者加拉赫在《郊区的终结:美国梦的转向》中所述,核心家庭已非常态,年轻人不再爱开车,郊区不得不面对贫困和犯罪,城市正在经历一场复兴,年轻人选择居住在更适合步行、活动丰富的社区(Gallagher LJ, 2013)。2015年,美国30个地铁都市区的可步行市区房地产份额首次超过郊区,并伴有大幅提高的租金溢价(Smart Growth America, 2020)。形态准则(form-based codes)正作为改革传统区划的新模式被越来越多的市县纳入立法(FBCI, 2021)。至2018年,全美有1477个社区通过了完整街道政策(SGA, 2019)。城市设计不再是专业者的技术活动,而是广泛的社会运动。

审视上述过程,可以发现城市设计学科发展存在着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

两个体系之间存在互构的过程。作用的机制可概括为如下三方面:①从学科内部结构看,学科体制的发展有利于拓展学科的广度与深度。学科文化则塑造了学科内部以及内外之间的行动取向。学术研究促进知识基础的发展对于学科发展起到阶梯性的作用;②从内、外部的关联看,学术研究活动是学科与外部互动的关键行动,而其力量源头是知识。包括适应社会实践需求的对象理论研究和方法技术研究,提升合法性的因果关联机制研究,取得社会支持的社会关联研究,拓展解题能力的相关专题研究,应对未来挑战的引领性研究,以及促进行业和公众的理解、参与、应用的大众传播知识研究等。除了通过知识,学术共同体还与社会直接沟通互动。同时,知识经过传播、应用、实践实现知识循环。脱离了知识循环的知识拓展会导致边缘繁荣而内核“中空”;③从外部结构看,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影响学科发展的关键因素,政治体制与公共政策也是重要环境因素,社会价值认同和资源环境挑战是潜在的影响方面,但影响程度与学科的自我定位和行动取向有关(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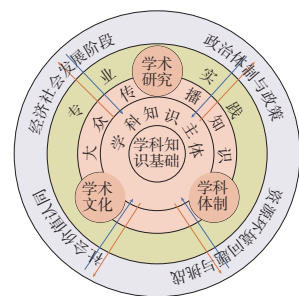


图5 城市设计学科与社会的结构和关系示意图

Fig.5 Diagram of the structure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design discipline and society
资料来源:作者制作。

上述论点可以从既有的学科和知识发展相关理论中得到支持。拉图尔关于科学家的行动解析提出“转译”(translation)的核心概念,科学家把研究兴趣转译为外部的兴趣,建立支持网络,学科的内部越大、越硬、越纯粹,则有越高的信用(布鲁诺·拉图尔, 2005)。这与美国城市设计学科发展注重社会价值和因果机制等相呼应。吉本斯提出知识生产模式2,即社会中多主体参与,跨学科,评议更面向社会等趋势,也可得到

印证(迈克尔·吉布斯,等,2011)。其后学者提出的模式3,如公众参与,关注自然环境,追求更强社会责任等在此也有显现(武学超,2016)。从社会学的结构化理论看,社会的结构包括规则、资源和意义三大方面,行动者既被社会结构所规定,又拥有能动的力量,不断产生着社会结构。本文的分析亦归于此(乔纳森·特纳,2006)。

4 研究结论

通过分析梳理中美两国城市设计学科发展的特征和学科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关联,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4.1 中美城市设计学科差异体现为学科结构和内容差异与内在的学术逻辑差异

两国均从建筑和规划学科发轫,学科基础有其共性,美国已形成多学科共同参与且面向公众的开放格局,学科结构处于更高阶段。学科关注内容重点也差别明显,我国聚焦编制实践,方法技术创新突出,兼顾宏观理论研究,但在因果机制探究方面存在一定断层,对社会价值和参与重视不足,总体上更加注重空间形态的塑造;美国以专题研究为核心,理论化程度较高,关于因果机制的主体研究内容充实,重视社会价值和社会问题,但对编制实践关注度低。更深层次上还存在着学术逻辑的差异,我国重视务实的理解应用,以 what (是什么)和 how (怎么做)问题作为知识基础;美国更注重科学性和价值性,除了认识和方法,还更多以 why (为什么)和 who (为了谁)作为知识基础。同时,美国学科文化有更高的开放度和对社会的使命意识及引领意识。

4.2 中美城市设计学科发展差异的成因在于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和学科与社会的关联

将城市设计学科、实践发展置于综合社会进程中分析,发现两国发展差异的结构性成因:首先,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美国处于城市化后期,社会维度的发展需求更加凸显,而我国经历了快速城市化阶段,经济发展,土地开发,城市营销等是主要实践场景。其次,政治体制差异也使城市设计发展

所依托的社会动力有所不同。此外,学科内部的文化、体制也有一定影响。除了这些客观因素外还有学科与社会关联的能动过程,我国学术探索结合实践应用有丰硕成果,理论和技术发展也居于前列;美国则显示出学科与社会互动的强关联,内外力结合推动美国城市设计走向“复兴”。

4.3 围绕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协同是学科与社会互动的主要行动

知识的创造是学科与社会互动的核心行动。通过响应社会需求,强化科学基础,拓展社会意义,增强解题能力,引领未来发展等知识生产提供与社会关联的力量源泉。通过大众传播与社会协同发挥学科的社会功能。而知识循环和社会认同反之也促进学科发展。

总之,城市设计学科内部,学科与社会之间存在结构性关系,而且“学科——实践——社会”之间还存在互构的行动过程,学科不仅需要与实践协同,更要与社会协同,这一过程通过社会意义,社会认可与应用拓展等过程实现。

4.4 研究对我国城市设计学科发展的趋势与转型的启示

基于上述发现,辩证地看待经验规律的应用价值,我国的城市设计学科需要面向社会发展转型实现学科发展的本土转型,重点为如下方面。

其一,巩固我国学科发展特色和经验。如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国家政策积极响应,紧密结合规划编制和管理实践,坚持外部引进和本土探索相结合,发展前沿技术等。

其二,辩证看待他国经验与我国国情不相适应的方面。美国过于侧重社会力量显然并不适应我国的制度环境;其研究与专业编制实践的脱节也不足取;其在土地私有、地方自治、种族问题和空间分异等背景下,聚焦社区邻里空间尺度,对城市和区域尺度关注偏少。

其三,面向未来转型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城市设计学科发展需要在主体意识、社会功能、学科体制与行动策略四个方面实现转型突破:①需要深化学科的主体意识,适应本土特征,问题和特色,夯实学科基础,增强因果机制和

证据的研究,强化学科的科学性与适切性基础;②需要提升社会功能,提高在社会中的定位和作用,重视价值导向和功能拓展的研究,确立城市设计在促进人和社会发展,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价值,领导未来议题等方面的作用;③需要创新建构学科体制,适应交叉学科的特性,改进学科组织,优化学科文化,通过多学科合作提升解题能力;④需要转变行动策略,发挥知识型社会中大学的核心作用,通过学术传播、平台建设、倡导与合作等,在行动中建构社会结构,推进学科、实践与社会各界的协同。

展望未来,在推动发展转型,满足人民需要,实现新时代发展愿景的过程中,城市设计不仅可以是风貌管理工具,还可以发挥创新、治理、发展等综合功能,在新型城镇化,城市更新,文化特色,人的全面发展,公平和韧性,碳中和与可持续等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4.5 结语

本文建立比较框架,以城市设计研究现象为切入点,分析学科与社会进程的关系,得出学科内部和外部关系的若干规律,以期对未来学科发展提供些许启示。由于视角宏观,样本数量和事件选取有限,研究精度并非微细,但是所得结论应能反映出大的特征与趋势。更加精细深入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开展。

注释

- ① 我国近似分为9个聚类,聚类模块值 $Q=0.6965$,大于0.3,聚类结构显著;聚类平均轮廓值为0.3072,小于0.5,为近似划分。美国分为8个聚类, $Q=0.7825$,大于0.3,聚类结构显著;聚类平均轮廓值为0.6675,大于0.5且接近0.7,结果可信且接近令人信服。
- ② 中国样本通过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人工计算年均被引量;美国样本根据Web of Science年均被引量。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ANSELIN L, NASAR J L, TALEN E. Where do planners belong? ass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J]. Journal of Plan-

- 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1, 31(2): 196-207.
- [2] APA. National planning awards[EB/OL]. 2021-2-28. <https://www.planning.org/awards/>.
- [3] ASLA. ASLA professional awards | asla.org [EB/OL]. 2021-2-28. <https://www.asla.org/individualaward.aspx?id=4244>.
- [4] CDC. Healthy people — healthy people 2020 minus SAS stats[EB/OL]. 2021-2-23. https://www.cdc.gov/nchs/healthy_people/hp2020.htm.
- [5] CEP. Cep. gov [EB/OL]. 2020-12-22. <https://www.cep.gov/>.
- [6] Congress. H. R. 4174 — 115th congress (2017-2018): foundations for 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act of 2018 [EB/OL]. 2020-12-22.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4174>.
- [7] FBCI. Form-based codes institute — fostering time-tested urban form [EB/OL]. 2021-2-28. <https://formbasedcodes.org/>.
- [8] GALLAGHER L J. The end of the suburbs: where the American dream is moving[M]. New York: Portfolio/Penguin, 2013.
- [9] 迈克尔·吉本斯, 卡米耶·利摩日, 等. 知识生产的新模式: 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M]. 陈洪捷, 沈文钦, 等,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GIBBONS M, LIMOGES C, et al.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M]. CHEN Hongjie, SHEN Wenqin, et al. translat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 [10] 侯丽. 美国规划教育发展历程回顾及对中国规划教育的思考[J]. 城市规划学刊, 2012(6): 105-111. (HOU Li. American planning education in retrospect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China [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2(6): 105-111.)
- [11]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initiative [EB/OL]. 2020-7-30. <https://www.hudexchange.info/programs/sci/>.
- [12] 金广君, 林姚宇. 论我国城市设计学科的独立化倾向[J]. 城市规划, 2004(12): 75-80. (JIN Guangjun, LIN Yaoyu. Dependence dependency of the urban design subject in China[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4(12): 75-80)
- [13] 布鲁诺·拉图尔. 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M]. 刘文旋, 郑开,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5. (LATOUR B.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M]. LIU Wenxuan, ZHENG Kai, translate.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005.)
- [14] 李少云. 城市设计的本土化研究——以现代城市设计在中国的发展为例[D]. 同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LI Shaoyun. Nativization of urban design—modern urban design in China as the case [D]. The Dissertation for Doctor Degree of Tongji University, 2004.)
- [15] 苗力田.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7卷[M]. 亚里士多德全集编译组,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MIAO Liti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volume 7[M].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Compilation Group, translate. Beijing: China People's University Press, 2016.)
- [16] 国家统计局. 统计数据[EB/OL]. 2021-2-26. <http://www.stats.gov.cn/tjsj/>.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Statistics data [EB/OL]. 2021-2-26.)
- [17] OECD.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R]. 1996.
- [18] PUNTER J. Developing urban design as public policy: best practice principles for design review and development management [J].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07, 12(2): 167-202.
- [19] 乔纳森·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 第7版. 邱泽奇, 张茂元, 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TURNER J. The 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y[M]. 7th edition. QIU Zeqi, ZHANG Maoyuan et al, translate. Beijing: Huaxia Press, 2006.)
- [20] SANOFF 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methods in design and planning[M]. New York: J. Wiley & Sons, 2000.
- [21] SGA. The best complete streets policies of 2018 — smart growth America[EB/OL]. 2020-8-24. <https://smartgrowthamerica.org/resources/the-best-complete-streets-policies-of-2018/>.
- [22] Smart Growth America. Foot traffic ahead: 2016[EB/OL]. 2020-7-29. <https://smartgrowthamerica.org/resources/foot-traffic-ahead-2016/>.
- [23] SOUTHWORTH M. Designing the walkable city[J]. Journa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2005, 131(4): 246-257.
- [24] 童明. 项目导向还是系统导向: 关于城市设计内涵的解析[J]. 城市规划学刊, 2017(1): 93-102. (TONG Ming. Project- or system-orientation? the connotation of urban vs. city design [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7(1): 93-102.)
- [25] 王建国. 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1. (WANG Jianguo. Modern urban design theory and method[M].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6] World Bank. Indicators: data [EB/OL]. 2021-2-21.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 [27] 武学超. 西方学者对模式3知识生产的多视角理论阐释[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6, 33(11): 147-151. (WU Xuechao.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mode 3 knowledge production by western scholar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J].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16, 33(11): 147-151.)
- [28] 吴志强, 于泓. 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方向[J]. 城市规划学刊, 2005(6): 2-10. (WU Zhiqiang, YU Hong.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urban planning discipline [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5(6): 2-10.)
- [29] 徐苏宁. 城乡规划学下的城市设计学科地位与作用[J]. 规划师, 2012(9): 21-24. (XU Suning. Urban design status and function of urban rural planning discipline adjustment [J]. Planners, 2012(9): 21-24.)
- [30] 余柏椿. 我国城市设计研究现状与问题[J]. 城市规划, 2008(8): 66-69. (YU Bochun. China's urban design study: current situations and problems [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8(8): 66-69.)
- [31] 张颖, 宋彦. 美国城市设计专门教育的进展和现状——以六所大学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 35(6): 106-119. (ZHANG Ying, SONG Yan. Evolution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urban design specialized education in the US: case study on six universities [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20, 35(6): 106-119.)

修回: 2021-06